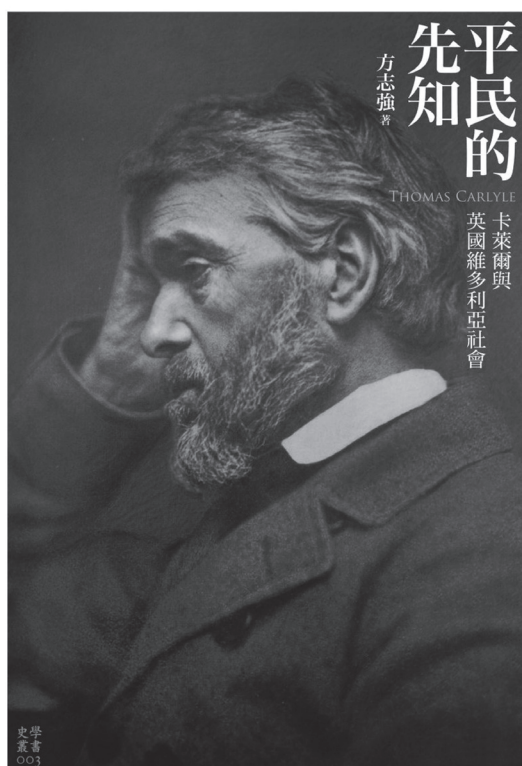




# 《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 的成書與後續研究<sup>#</sup>

方志強\*



首先，我想說明我的專書《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成書過程。如今回想起來，我與十九世紀英國的卡萊爾（1795-1881）算是很有緣。在我青年到中年的學習與研究歷程中，卡萊爾始終是我的學術研究

<sup>#</sup> 本文內容改寫與增補自《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自序（頁 iii-vi）與導論（頁 1-22）。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的重點。最初對卡萊爾感興趣，是在國內念研究所時，因為讀了古奇（G. P. Gooch）的《十九世紀的歷史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13）一書中對於「兩個卡萊爾」的討論，而產生了疑問。古奇在其書中已注意到卡萊爾的兩種不同的歷史思想，但他認為「當卡萊爾從事歷史寫作時，所寫的是偉人的傳記，而非無數的與無名的大眾的歷史；而他在中晚年所致力的那種歷史寫作，正是他在1830年所批評的。」對於這種轉變，古奇並未提出合理的解釋；加上「英雄史觀」始終是前此學術界與社會大眾探究卡萊爾思想的焦點，這引發我想了解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何？當時因資料與時間所限，我並沒有深究，只是在我所閱讀的書中寫下了這個疑問。

當我在民國75年，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試後，我負笈遠赴英國留學。當時是以英國十九世紀的史學為我的研究範圍，那時在思索論文題目時，我重讀我在古奇書上所寫的案語，這提醒我此時是探究的好時機。我將這個想法與我的指導教授討論，他非常同意這個想法，因此我就真正展開對卡萊爾的研究。隨後，我了解到卡萊爾是十九與二十世紀的英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家，並且隨著時代變遷與隨之而來卡萊爾聲譽的升降，卡萊爾的形象曾歷經多樣的變化。

卡萊爾在世時，即已爭議不斷。其死後，為其作傳的門生也是當時著名的史家弗路德（J. A. Froude, 1818-1894）出版了卡萊爾的傳記、回憶錄、日記與書信。卡萊爾在世時，其私人生活是不為一般人所知的。其去世後，因回憶錄、日記、書信、傳記的出版，普受大眾的矚目，他們夫婦的隱私已成為大眾注意的焦點。很多人批評弗路德在處理卡萊爾的手稿上過於輕率，以致造成巨大的論爭。然而，弗路德深信，他的責任是真實的呈現卡萊爾夫婦，而非把他們描述為大眾的偶像，而把他們像耶穌聖母一樣供奉在教堂裡。

弗路德所欲極力呈現的是「真實的」卡萊爾夫婦的形象，與前此時人所熟悉的「典範的」形象有很大的差異。在這些書中顯示了卡萊爾的頑固、直言不諱、自大、自負、喀爾文式的嚴酷，以及過分自我完全不顧及他人的感受。社會大眾對書中的記載頗為震驚。弗路德對於卡萊爾夫婦的描述的真實性引起輿論界的關切，產生的意見頗為紛歧。大體上，可分為忠誠者（the loyalists）與修正者（the revisionists）兩大陣營。

卡萊爾聲譽的下降，部分是因「弗路德論爭」（the Froude Controversy）所造成的對卡萊爾個性的不滿所致；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應是對卡萊爾不友善



的社會與學術環境。縱使卡萊爾的聲譽歷經了十九世紀末功利主義與進化論流行的衝擊，仍能屹立不倒，但當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式的工業與民主不斷發展時，他已被視為「最不受信任的先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後幾年，對卡萊爾而言，是更加不幸。他所宣揚的理念被指控為直接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1914年7月，英國的一位女權運動者在英國國家肖像館將館中所陳列的卡萊爾肖像劃了一刀，<sup>1</sup>這與當時視卡萊爾為反民主與歧視女性的代表人物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再次成為被批的對象，被指為是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與種族主義的先驅。其中班特力（Eric Bentley）於1945年甚至宣稱卡萊爾已死，不值得大家重視。

一般而言，卡萊爾的聲譽與形象大體可簡分為三個階段：受歡迎階段（卡萊爾在世時，尤其是1830與1840年代）、倒退階段（由1881年去世後至1930年左右）、與學術批評階段（由1930年至今）。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曲線來顯示卡萊爾在這三階段的聲譽。大體而言，在第一階段中，其聲譽是逐漸上升，以其去世時居最高點；在第二階段中，其聲譽迅速下降，進而跌到谷底；在第三階段中，其聲譽逐漸上升。卡萊爾聲譽的升降主要是人們把他定位為先知而評定的。在第一階段中，是由「教師」（Teacher）的形象所主導；而在第二階段中，其形象則轉為「斥責者」（Denouncer）；到了第三階段，則為「文學天才」（Literary genius）。

在對卡萊爾聲譽的檢討中，我們得知其聲譽的上升與下降皆基於公眾輿論對其人格與著作的評價。而輿論界的意見有明顯的兩極化現象，崇拜者（idolaters）與詆毀者（maligners）壁壘分明。我們不妨比較評論家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 1831-1923）與蓋爾（Pieter Geyl）對卡萊爾的評價，以顯示其間的差異。哈里森視其為一個「偉大的散文詩人」（a 'great prose-poet'），他讚美卡萊爾的人格，認為其篤實、意志堅強、慷慨寬大、真誠、忠實、單純、和藹、具有英雄般的勇氣竭盡心力為社會奉獻一生。<sup>2</sup>相反的，蓋爾認為

<sup>1</sup> 館中所陳列的這幅畫像為名畫家 J. E. Millais 所繪，為公認最能表現卡萊爾氣質的肖像畫之一。筆者在英留學期間居住在倫敦，曾多次前往 Chelsea 區的 Carlyle's House，也曾至偏遠的蘇格蘭卡萊爾的老家。在訪談中得知，這些管理人員都是無薪給的自願義工。現任卡萊爾老家的義工為 Nancy Walter 女士已服務十多年，其前一任也是一位女士，任職由 1937-1980 長達四十多年。與欣卡萊爾畫像的女士相對照，同為女性，在鄙視與景仰之間，對待卡萊爾差異之大令人驚異。

<sup>2</sup> Frederic Harrison, "Froude's Life of Carlyle" in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Jan. 1885); reprinted in *The Choice of Books* (London, 1887), pp. 176, 180.

「兇暴」(violent) 與「激情」(passionate)，是描述卡萊爾的性格最好的字眼，他稱卡萊爾為「動亂的唆使者」(an abettor of the upheaval)，因為卡萊爾頌揚權力。<sup>3</sup> 哈里森與蓋爾代表了各自陣營對待卡萊爾的態度，崇拜者頌揚其人格，把他定位為詩人或文人；詆毀者貶斥其人格，鄙其為錯誤的先知。

我博士論文所探討的主題是「卡萊爾的平民思想」，此主題一反前此學者們對其「英雄史觀」的強調。而我的主要論點為，卡萊爾的平民思想為其早年、甚至是晚年的歷史思想與社會評論的中心。

我對卡萊爾的研究，並未因博士論文的完成而結束。隨著我自己人生閱歷的成長與史學研究的開拓，我又拓展了對卡萊爾研究的角度與面向。近年來，新文化史頗受矚目，有關「身體」、「疾病」、「瘋狂」等議題也受到學界的重視，我也多少注意到這種趨勢。然而，我以「身體」與「疾病」的角度重新來研究卡萊爾，主因受到外在環境的刺激而產生。我在大學輔導多年的導生中有一位身心障礙的學生，他有失眠的問題與人際關係很差的問題。而我的另外一位品學兼優的導生，因課業與失戀的壓力，而有自殺的傳聞。這刺激我對精神疾病的注意，也促使我對年輕的卡萊爾所遭受到的「憂傷」(包括孤獨、失眠、瀕臨精神崩潰與自殺的邊緣等問題)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去探討。

在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上，「智識與道德」的層面始終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因此，「赤爾西賢者」(Chelsea Sage) 始終主導著人們對其形象的看法。實際上，卡萊爾的形象是多樣的，前此學者們的研究無法顯示卡萊爾多樣的面貌，因為他們過於重視智識與道德的層面，而忽略了卡萊爾自身。誠如卡萊爾的妻子珍 (Jane Welsh Carlyle, 1801-1866) 曾憤慨的指出卡萊爾同時代的人都把卡萊爾看錯了，因為他們皆只看待卡萊爾為「赤爾西賢者」，而不知他具很多類型：隱士、朋友、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慈愛者、同情者、忠誠者、鍾情者、負責的人子、怠慢的先生、善辯者、自詡的藝術家、尖銳的諷刺家、傑出的談論者。因此很難了解甚至沒有注意到卡萊爾為什麼是隱士、獨白者、抱怨者、哀悼者、神經過敏者……？這種現象在討論年輕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上更是明顯。

這讓我聯想到我前此的一個研究重點：卡萊爾的「憂傷與改變」的問題，尤其是「整個英國文學史上最為人所知的個人經驗之一」的雷絲路事件 (The

<sup>3</sup> Pieter Geyl, *Debates with Historians* (Collins, 1955), pp. 51, 53.



Leith Walk Incident)。在這方面，我已經陸續寫了兩篇文章。第一篇〈論卡萊爾雷絲路事件的年代——迷思與事實〉(《新史學》，第十五卷，第四期，頁149-196，2004年12月)，此文旨在重建卡萊爾「憂傷與改變」的關鍵事實：雷絲路事件。企圖由雷絲路事件的年代問題所顯示的爭議性與複雜性，來顯示前此學者對此事件有關史料與觀點的問題，以及其對此事件的誤解。

第二篇為〈煉獄與新生——卡萊爾的病(1814-1823)與雷絲路事件〉(《新史學》，第十七卷，第三期，頁61-119，2006年9月)，此文不採取「智識與道德發展的」角度，而採用卡萊爾當時的書信所強調的「身體健康」的角度來探討卡萊爾的雷絲路事件。因此，著重在討論卡萊爾的「病」，以卡萊爾當時的眾多書信為基礎，卡萊爾的日記、回憶錄、自傳式的小說為輔，來詳細了解卡萊爾病情的出現與發展，以及其與雷絲路事件的關係。

此文注意到卡萊爾的「駭伯症」(“hypochondria”)，而認為這是卡萊爾「憂傷」的根源。此文先檢視卡萊爾生理的疾病，那就是胃腸病。再經由對前此只知專注在胃腸病的問題而無法真正了解卡萊爾的病的探討，來引出卡萊爾病情的關鍵——駭伯症。接著討論卡萊爾的心理疾病駭伯症，也就是他所說的「靈魂的疾病」，此病使他「吞噬我自己的心」，陷入煉獄之中，甚至發生嚴重到精神崩潰的「神經疾病」。卡萊爾在雷絲路事件中頓悟到只有堅決的對抗，才能脫離駭伯症的魔掌，從此展開一生與駭伯症的鬥爭。因此，卡萊爾在雷絲路事件的轉變是其掙脫煉獄、獲得新生的關鍵。

我的97與98年度兩年期的國科會專書寫作計畫「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就是在前此研究的基礎上，對卡萊爾的病與智識道德的發展作進一步綜合的探究。除了已注意到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外，特別補充「疾病」這個角度的研究，由對卡萊爾個人患病事實的考證與確定，以及其所採取治療的途徑，進而討論卡萊爾的疾病所呈現的論述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關聯。本計畫所增補的「疾病」的角度，集中在卡萊爾作為「病理學先知」(the prophet-pathologist)的探討。

卡萊爾作為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的先知與「疾病」是息息相關。卡萊爾個人年輕時即罹患「神經疾病」，一輩子在其陰影的籠罩下，「健康」受損，故深知健康的重要。而其與「神經疾病」的鬥爭，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使其從瀕臨瘋狂中解救出來。這種經歷更促使其對「疾病」與「人」的本質有更深的體悟。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所流行的「神經疾病」，乃因工業革命後，英國由

農業社會過渡為工業社會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明病」，此疾病在維多利亞時期為流行的顛峰。無論男女，很多人罹患「神經疾病」；輕者只是憂鬱，重者則會瘋狂，有的以自殺結束痛苦。在維多利亞時期，當時社會最關切的問題，不是宗教，不是政治，不是改革，也不是達爾文思想，而是健康（health）。

卡萊爾以專業文人為其職業，其所作的論述，不再只是私人的言談，也表現為具廣大影響力的公共議論，具有明確的目標。卡萊爾認為他所處的時代是「有病的與脫節的時代」，幾乎所有卡萊爾著作中皆有一個一貫的主題，那就是「人如何在這有病的脫節時代中生存？」這種作法頗契合當時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對「健康」重視的需要。

因此，本書就是在我前此研究的基礎上，對卡萊爾的病與智識道德的發展作進一步綜合的探究。除了前此已注意到的「智識與道德」的角度加以補充改寫外，特別加入「疾病」這個角度的研究，本書的第二章「憂傷與改變」、第三章「疾病與新生」、第四章「有病與失序時代中的人」，由對卡萊爾個人患病的討論，擴大為卡萊爾對疾病的論述與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社會的關聯。相信由「平民的先知」這個角度，來探討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應能提供較完整且新穎的看法。此兩年期的專書寫作計畫已經執行完畢，以書名《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由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於2011年12月出版，列為《史學叢書》的第三本。（此書獲得國科會101年度出版補助）。

我的專書《平民的先知——卡萊爾與英國維多利亞社會》出版後，我對於卡萊爾的研究仍舊持續的進行。我101年度所申請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卡萊爾『平民先知』的形象」，主要在結合我前此對卡萊爾的研究成果，將卡萊爾視為是具「鄉野之眼」與「平民觀念」的「農民的聖者」、本身罹患神經疾病為「有病與失序時代」的「病理學先知」，以及十九世紀維多利亞社會的「平民先知」。由此而言，卡萊爾的形象與前此所重視的「赤爾西賢者」、「錯誤的先知」與「文學大師」應有很大的差異。

此研究計畫企圖探討卡萊爾的形象，在文字傳記的研究基礎上，藉由其一生重要的圖像（包括繪畫、照片、漫畫）以呈現較完整（兼具身心層面）的面貌。除了一般所熟知的「赤爾西賢者」的光明面的形象外，我尤其著重「平民先知」的角度，注意其「鄉野的」、「陰鬱的」、「憤怒的」、「瘋狂的」、「農民的」神情與外貌。

對於卡萊爾的肖像，有一個很自然的區分，有沒有蓄鬚？1854年10月



卡萊爾(59歲)開始蓄鬚。從此之後一直到其去世,鬚子就成為卡萊爾面相上一個顯著的特徵。「未蓄鬚」的卡萊爾與「蓄鬚」的卡萊爾,似乎符合「年輕的」卡萊爾與「年老的」卡萊爾的區分,又與「浪漫的文人」與「憤怒的先知」的區分若合符節。事實上,不同時期肖像畫家繪製卡萊爾肖像的風格,也呈現出由重視「美感」的呈現,到重視「個性」的呈現,再到追求「和諧」的境界。

卡萊爾的肖像基本上可區分為三期:前期(1832-1854)為「浪漫的文人」、晚期(1855-1872)為「憤怒的先知」、末期(1873-1881)為「孤獨的老人」。著名的英國史家泰勒(J. P. Taylor, 1906-1990)1981年曾參觀在倫敦所展出的卡萊爾逝世百年肖像展,他看到不同的肖像畫家在不同時期所呈現不同的卡萊爾形象。年輕的卡萊爾具有「浪漫美」(romantic beauty),晚年則像「舊約先知」(an Old Testament prophet),死前歸於平淡。<sup>4</sup>泰勒的觀後感,很適切的表達出卡萊爾肖像展所呈現的卡萊爾不同時期的面貌的特色。相信藉由文字傳記與圖像的綜合研究,應能較完整的呈現卡萊爾多樣的形象,以及明瞭不同時期的變化。

我103年度所申請的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是「『歐洲的孔子』——威爾森對於卡萊爾形象的塑造」。威爾森(David Alec Wilson, 1864-1933)所寫六冊的卡萊爾傳(1923-1934)被認為是卡萊爾傳記中「最正確的傳記」,其將卡萊爾塑造為「歐洲的孔子」形象。在二十世紀「弗路德的爭議」與批判卡萊爾的風潮中,對於卡萊爾形象的塑造上,威爾森與其他卡萊爾的擁護者採取不同的方式。一般是將卡萊爾視為是「文學天才」,威爾森仍是以「社會導師」的角度為卡萊爾辯護,甚至將卡萊爾比擬為「歐洲的孔子」,擴大「赤爾西賢者」的涵蓋性,由英國的名人擴展為世界性的偉人。此研究計畫企圖探討為何威爾森會賦予卡萊爾「歐洲的孔子」這樣的稱號?這樣的稱號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威爾森將卡萊爾與孔子相比擬,威爾森是如何形塑「歐洲的孔子」這樣的形象?將卡萊爾與孔子相比擬,這種比擬在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上有何價值?

經過多年來對於卡萊爾的研究,我很認同英國史家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在其《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的序中所說的:「改

<sup>4</sup> 參見 J. P. Taylor, *An Old Man's Diar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84), p. 39.

變形態，正是歷史的本質所在。」歷史有如希臘神話中海神普洛特斯(Proteus)的面貌是千變萬化的，當你捕捉了歷史的一個形態時，它卻又已改變了形態，有時根本完全不可辨認。<sup>5</sup> 這種說法顯示出史家對於歷史的研究有著無法超越的限制。

史家研究過去有其客觀的限制，史料不全是一先天的限制。另外，史家研究歷史無法與過去的進行方式相同，也是一難以超越的限制。過去的進行是立體的，是卡萊爾所謂的「存在的混亂」(Chaos of Being)，此存在物不斷的在運作，由無數的因素中不斷塑造，不斷改變其形象；<sup>6</sup> 而史家的歷史研究基本上是線性的，以線性的研究欲掌握立體的過去猶如以管窺天。

史家研究過去除了客觀的限制外，也有時代變動與史家個人好惡的主觀限制。時代在不停的變動，史家為時代中的人，受到時代變動的影響，對歷史上的問題提出種種不同的看法，並冀望對自己的時代有所影響，史家與時代間有著永無休止的互動關係。當我們這個時代的史家企圖去了解與評價歷史上的人物時，自然會受到當代的影響，不免有時代的隔閡，難以給予真確的評價。因受到時代變動的刺激，以及史家個人好惡的影響，我們對過去的人物產生了不同的評價，甚至塑造出不同的形象。

<sup>5</sup> 湯恩比著，陳曉林譯，《歷史研究》(臺北：桂冠圖書公司，增修訂再版，民國68年)，原序，頁32-33。

<sup>6</sup> 參見卡萊爾‘On History’一文(收錄於《卡萊爾全集》(Works)第27卷)。